



看上海 ■ 张文志

岁月悠悠

# 围垦岁月琐忆

■ 范正青文

人生四季,充满酸甜苦辣。那是一九六一年,我们国家正遭受三年困难时期,而我的家里更贫穷,因交不出学费我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,但待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,吃不饱且不说,母亲的唠唠叨叨,父亲的严厉责骂,简直让我坐卧不安,于是,“穷则思变”,想早点找份工作,去自由飞翔。

当时我家住在毗连党的“一大”会址旁的石库门弄堂里,属原来的卢湾区管辖,离重庆南路区政府近在咫尺,有一天,我看到区政府大门口贴出一张招收学徒工启事,我想机会终于来了,便连忙到居委会填表报名,手续很简单,经过体检后隔了没几天,我就收到了区劳动局发来的录取通知。

我喜出望外,但仔细一看,不禁心凉了半截,原来要去的招收单位是又苦又累又脏的建筑行业。脑子里打转了半天,有点犹豫起来,去吧,我这个在家过惯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生活的“白面书生”受得了吗?不去吧,看看家里只靠父亲一人的薪水养活五六口人。我还是咬咬牙去报到了。

那天,父亲帮我提着铺盖,从卢湾区的家里一直送到杨树浦路底的单位,看到露天作业的建筑工人沉重的身影,我真有一种被流放到荒岛的酸楚感。勉强干了不到一年,因基建项目下马,我和其他一百多名工人、学徒又被派到崇明岛参加围垦。

当年的崇明岛,是荒芜、落后的代名词,离市区远,交通不便,经济滞后,被江水冲积成的一片茫茫的盐碱地,在太阳底下泛着晶亮的白光,连田沟、池塘里的水也是咸的。这种盐碱地面积虽年年有扩大,但不经过改良处理,是无法种植农作物的。为了开发崇明岛,市专门成立了农垦局,从各行各业抽调人员组成浩大的围垦大军,跨越长江口,来到了崇明岛上,开展了一

场向荒滩要土地、要粮食的史无前例的战斗。

围垦生活既枯燥又艰苦。先说睡吧,我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,那泥地又潮又湿,没有床,只有竹榻放上一个草垫子,半夜醒来,被子湿漉漉的,还爬满了虫子,身上被咬得奇痒难挡。小螃蟹是崇明的一种特产,随处可见,有好几次,我从被窝里还抓到过小螃蟹!

再说干活,我们劳动的主要内容是挖泥、挑泥,用以构筑防洪大堤,这样才能确保围垦出来的“处女地”不受海水侵蚀,再经过不断的整治和改造,使盐碱地变成稻浪翻滚的片片良田,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,也是福荫子孙后代的希望工程。我们每天重复着这种又脏又累的活,夏天收工后,虽一身汗臭,但因条件限制无法供应热水洗澡,只能到附近小河沟或池塘里用冷水擦擦身,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打上来的水是咸的,擦了半天身上还是黏乎乎的。农家虽有人工打的井,但这井水是他们用来煮饭烧菜的,平时都舍不得用,我们要遵守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不能随便越雷池半步。

至于吃的问题,说出来可能现在年轻一代不大相信,但确是一段辛酸的历史。由于要干重活,每个人的饭量大增,往往寅吃卯粮,一个月的计划定粮,上半个月就吃完了,怎么办?借是借不到的,补助也很困难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好在崇明盛产蚕豆,买几斤剥了煮熟充饥。崇明的老乡用螃蟹烧青菜,拿到我们宿舍来卖,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,毕竟也能填饱肚皮。慢慢地,我们习惯了艰苦的围垦生活,还用编故事、唱歌来充实业余时间。

如今,我已届颐养天年的阶段,回眸人生走过的足迹,皆已成财富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意犹未尽

# 一朵小小的浪花

■ 赵英琦文

今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这一辈,真正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,每一个个体,都是改革浪潮中的一朵朵小浪花。我的战友、上海援建北大荒知青陆建国就是其中的一朵。

陆建国自小是个天资聪慧、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走上工作岗位后,他的聪明才智在学雷锋、助人为乐中得到极大的发挥。在北大荒兵团的日子里,他从农工当上了电工,在零下二三十度严寒中,及时处理马厩电机故障;他的工作包常带着自费购买的灯泡,有哪家灯泡钨丝烧断了,他就默默地帮人家换只新的;他自学了理发,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为同事义务理发,什么发型都难不倒他;还买来海鸥照相机研究,经常给大家拍照留念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中国实行改革开放,渐渐从封闭走向新的发展。

20多岁的陆建国此时返回上海,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,后又受命参与组建一家新的工厂。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,他患了严重的肝病。期间,工厂购进一套设备,却无人会安装。陆建国带病“出山”解燃眉之急,他早出晚归一心扑在新设备钻研安装上,仅用半个月就让设备正常运转,拼命的劲头全然不像病重之人。

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,各种家用电器纷呈亮相。业余时间,陆建国就琢磨家用电器原理,电风扇、台灯、收音机,没有他不会修

的。有一年,看到同学的工程师父亲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让他很觉新奇和激动。与女友惠兰相恋三年,还没有准备新婚礼物,他决定组装一台黑白电视机献给恋人。凭着手头一份线路图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,他到上海无线电十八厂门市部买来零部件,历经三四个多月时间,一台19寸黑白电视机顺利组装并接收到信号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凭票供应、价值三千多元的电视机,这无疑是最耀眼的礼物了,一时被街坊邻居津津乐道、传为佳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沪上已时兴出租车行当。一天,陆建国的朋友开一辆尼桑出租车来,请他修理车内收音机,不到半小时,收音机就恢复正常。此后,朋友向杨浦捷达汽车租赁公司老总推荐了陆建国,求贤若渴的公司领导一口应允。

年近三十换行当,对陆建国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。

他去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认真学习,发动机、底盘和电气线路等插图,他都自掏腰包复印下来认真揣摩。凭着极高的悟性,他熟悉掌握了汽车内部各个系统。

书本中汲取营养,专注于每一个工作细节,公司领导很快就发现了陆建国的非比寻常,任命其为维修组组长。他没有退缩,勇于担当,接手了大发、尼桑、拉达等八十多辆出租车的维修保养任务。

陆建国带领维修组全体员工以节省管理费为原则,能修好的零部件决不换新;能及时修好的决不“磨洋工”,即使半夜出修也随叫随到。在他影响下,维修组修车技术精湛、风

清气正。“钻技术有手艺,从不端架子争好处。”群众心里有杆秤,陆建国几乎年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。

智能手机微信刚刚兴起时,战友在群里发了当年在兵团时的黑白照片,大多是陆建国当年的作品。“建国做事认真,经过多次调配,才摸索出显影定影调配规律,洗印一组照片,经常忙到半夜时分。”那时的黑白照片,千里迢迢寄往各大城市,抚慰了太多城里长辈的思念之心。而陆建国分文不收,为大家留下年轻时代的珍贵记忆。

随着知青聚会活动的频繁增加,陆建国又成为每次难忘相逢的记录者,为大家拍摄了大量照片;大家在微信群里交流的照片,他也会悄悄地保存好。之后,他买来照片打印机和塑封机,默默地打印塑封好送给大家。他像以往一样默默做好事,处处为别人着想。

我们却很久以后才知道,他是位身患癌症的病人。

胃癌晚期患者常伴有剧痛,陆建国和爱人商量,去临终关怀医院,以免影响她休息。在医院里,陆建国和爱人回忆北大荒的青春往事,亲手为爱人理发、剔鱼肉,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。

对我和另两位相处近五十年的战友,陆建国把“一生顶喜欢的东西”分别送给了我们。一台旧收音机、一辆自行车和一架照相机,这些旧物件既见证了我们的深厚情谊,也见证了陆建国的青春和生命。

今年五月初,在最后的日子里,陆建国弥留之际叮嘱爱人,他走了以后,不要惊动任何人,他要像一朵浪花,永远与大海在一起。

世相百态

# 小时候的房子

■ 夏云文

这世上所有的人都会有某一刻想要回家的渴望,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。从走出到独立到回归,几乎是一个轮回,一个大大的圆圈。

回家是复杂的旅程,和小时候重逢,与故乡情节碰撞。这些弱不禁风的老房子,筋骨老硬老硬的,如果有必要,它似乎可以永生,这不是异想天开。尽管它们在三四十年前就这么老态龙钟了,可如今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下,丝毫不为所动,坚守着自己的本份与沧桑。

石库门就这样得以保留。这是我曾经年幼的证据,虽然我儿时的照片玩具书籍书包,或者学生证等物件很少被保留下来,但弄堂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其它细节。红漆木门上是否还留着我们敲过的印迹?我记得,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,过节回家时,所乘的火车总是半夜三更到达上海,我曾经有过疑惑,火车为什么白天不到上海?于是这扇在白天紧锁的木门,在晚上悄悄留着门缝。

而我们,则在被窝里盘算,爸爸回来了,必定有好吃的,家里的气氛也会相对变得轻松民主。有一年,爸爸带回来一大筐桔子,应该有四五十斤,其它的诸如野鸭子野甲鱼之类,也时有所见。想想吧,爸爸回来的时候,应该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。

离开了这扇门后,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,邻居经常更迭成新的面孔,木门也换成了更加防盗的大铁门。当然,我们也养成了作茧自缚的习

惯,如果某个不熟的邻居过分热情,会引起我们的不安警惕。可能这是由居住形态、居住方式决定的。

再走进这个弄堂,我甚至有些害怕,特别怕被某人认出我是某人,或者认出我是某某家的孩子,这会把后三十几年的时间抹掉,只保留与他有交集的那段时光,会忘记自己的岁数。更多的时候,我愿意远远打量着老弄堂,拍几张照片,回去细细欣赏,步入自己的时光隧道——

旧时候的弄堂没有这么多废弃的自行车、电瓶车,旧时候弄堂虽小,看起来还是干净宽敞的。最多的是下棋打牌的小桌子,围观的人也很多,往往是融洽轻松的;

离家不远处的马路转角处有一家杂货小店,三十多年过去了,居然仍然开着,足见它的顽强。旧时,我常常攥着几分钱,或几角钱,在这家店打酱油,或买包盐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,在这家小店,与很多的乘凉的居民一起,站着看完了日本电影《追捕》。每当有精彩电视剧,这家小店总是让屏幕对着马路,乘凉的观众因此里三层外三层,日本电视剧《姿三四郎》,我站着看过很多集;

更多的黄昏,我喜欢抱着书本,在路灯下看书,以此消磨时间。我甚至在一篇《路灯》的文章中,写我的妈妈,为了节约电费,常常借弄堂里的路灯,为家里照明,想起来有些夸张,对不起老妈,但也不是凭空臆造;

路口还有一家小店也让人记忆犹深。这是一家大饼油条早点店,

店铺用简易的油毛毡做屋面,四周的墙也十分简朴,但这一点不影响他们早点的受欢迎程度。油条四分钱一根,还要半两粮票,我们家四口人买两根油条,蘸了酱油过泡饭,每人半根,十分严苛,否则只能啃酱菜,甚至酱油泡饭。那个时候,如果拿了一两粮票八分钱,而筷子上只戳回一根油条,就算闯了大祸:不是丢了分票,就是丢了粮票。半路偷吃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。没有哪个熊孩子有这么大胆。这家早点店除了常规的大饼油条,让我十分想念的是一种咸浆,做法是在豆浆碗里,把油条切成寸段,浸泡在豆浆里,再撒上一些碎榨菜。我常常看着吃客一口咸浆一口大饼,嚼得津津有味,十分惬意诱人,心想我有出息之后,必定要痛痛快快地吃上一碗咸浆。

那时,父亲在外地工作,妈妈带我们仨孩子,住21平方米,没有卫生间。厨房间是公用的,每家有大约一个多平方米的固定面积,放一只煤炉,旁边一块小搁板,好像也没有更多的炊具。这样的厨房给我的印象就一个字:黑,不管白天还是晚上,都十分黑。里面没有脱排油烟机没有水斗,到处是积灰,一个小窗十分狭小透光有限,排风困难。也没有公共照明,每家都有独用的15瓦灯泡。如果张家和李家在厨房做饭,张家做好后回房间了,会把自家的灯泡关掉,厨房顿时一片漆黑,李家这时会想起,原来自家的灯没有开。

光阴似箭,看着这些照片物是人非,岁月催人老。